



高教研究信息简报

第 33 期

右江民族医学院

高等教育研究所编

2018 年 12 月

目 录

· 本期关注 ·

中国教育 波澜壮阔四十年.....	1
新时代高等教育的历史方位和发展走向.....	5

· 高教之道 ·

地方高水平应用型大学建设的思考与实践.....	12
大学的新形态与卓越追求.....	18

· 国际教育 ·

大学的传统与改变——德国高等教育一瞥.....	24
-------------------------	----

· 课程思政 ·

课程思政建设必须牢牢把握五个关键环节.....	29
立德树人：高校“课程思政”的探索与实践.....	32



• 本期关注 •

中国教育 波澜壮阔四十年

1978 年 12 月，党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时代序幕。40 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披荆斩棘、砥砺前行，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创造了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惊天动地的发展奇迹，绘就了一幅史无前例、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教育是改革开放的先行者、受益者、助力者。40 年前的中国，百废待兴。邓小平同志以历史的眼光一锤定音，“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恢复高考点燃亿万青少年学习热情，科教兴国逐步确立为党和国家的发展战略，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成为时代和国家的最强音，中国教育进入快速发展的轨道……改革开放 40 年，我们始终坚持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牢固确立并坚定不移地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战略地位，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40 年来，中国教育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13 亿多中国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全面提升，教育总体发展水平跃居世界中上行列，成为全世界规模最大、发展速度最快、发展潜力最大、特色最为鲜明的教育。

40 年的发展是跨越性的。1978 年，我国小学升入初中比例只有 60.5%，高校在校生 85.6 万人，研究生 1 万人。在极为薄弱的底子上，经过 40 年努力，目前我国各级各类学校 51.4 万所，在校生 2.7 亿人，教育规模位居世界首位。学前教育三年毛入园率从 10.6% 提升到 79.6%，小学学龄儿童净入学率从 94% 提升到 99.9%，初中阶段毛入学率从 66.4% 提升到 103.5%，高中阶段毛入学率从 33.6% 提升到 88.3%，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 2.7% 提升到 45.7%，均达到或超过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我国用短短 20 多年时间走过了西方国家近百年的义务教育普及之路，速度超过一些发达国家。

40 年的成就是全方位的。从硬件到软件、从内容到方法、从传统管理到现代治理等，教育各种要素水平越来越高。1995 年教育法规定教育经费投入“三个增



长”，2012 年实现 4% 目标并保持连续增长，2017 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达 3.4 万亿元。1978 年，全国各级各类学校专任教师 899 万人，2017 年增加到 1623 万人，是 1978 年的 1.8 倍，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教师队伍初具规模。目前，我国已形成以 8 部教育法律为统领、包括 16 部教育法规和一批部门规章、地方教育法规规章在内的比较完备的教育法律体系，为教育发展提供了法治保障。

40 年的影响是世界性的。2009 年，上海中小学生首次参加 OECD 组织的国际学生能力测试（PISA）取得优异成绩，我国教育引起全世界关注。40 年来，教育对外开放呈现出国留学与学成归国同步扩大、来华留学与攻读学位同步增长、“引进来”与“走出去”同步提高的局面。来华留学规模从 1978 年的 1200 余人增加到 2017 年的 48 万余人，我国成为亚洲最大的留学目的地国。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达 2385 个，与 180 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教育合作关系，建立了 8 个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533 所孔子学院和 1140 个中小学孔子课堂遍布全球 150 个国家和地区，海外学习使用汉语人数达 1 亿人。

改革开放 40 年，中国教育发生历史性变革。中国教育的 40 年，是不断改革的 40 年，不断创新的 40 年，变革贯穿始终。40 年来，党中央先后 5 次召开全国性教育会议，谋划改革、部署改革、推动变革。

40 年来，办学体制更趋多元，以政府办学为主体、全社会积极参与、公办和民办共同发展的格局基本形成。从 1993 年“积极鼓励、大力支持、正确引导、加强管理”十六字方针，到 2002 年民办教育促进法正式确定民办学校与公办学校同等法律地位，再到 2016 年新修订的民办教育促进法明确非营利性和营利性分类管理，民办教育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有益补充”成长为重要力量。目前，全国共有民办学校 17 万余所，在校生 5100 多万人。

40 年来，管理体制更具活力，中央和地方、政府和学校之间教育职责权限逐步理清。义务教育从最初的“人民教育人民办”逐渐走向“人民教育政府办”，成为政府基本公共服务。1998 年部属高校调整撤并开启了新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宏观管理体制变革，实现了从“条块分割”到“三级办学、两级管理、以省为主”变革。持续改进职业教育管理方式，分级管理、地方为主、政府统筹、社会参与的管理体制不断完善。



40 年来，考试招生制度更加科学，回归教育规律，由重知识转向重能力、由“一考定终身”走向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从 1989 年标准化考试到 1999 年“3+X”改革，从 1984 年试行保送生制度到 2003 年自主招生改革，考试内容与招生方式不断完善。1998 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仅为 9.8%， “千军万马过独木桥”。1999 年，中央作出高校扩招的决策，当年全国高校招生 159.68 万人，比上年增长 47.4%。2014 年，启动自恢复高考以来最系统、最全面的一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2017 年上海、浙江成功试行新高考。

改革开放 40 年，中国教育呈现历史性变化。牢牢坚持为人民服务、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努力适应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要求，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期待，有效支撑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不断提升。

40 年来，教育体系不断完善，受教育渠道大幅拓宽。纵向上，学前、初等、中等、高等各层次教育相互衔接；横向上，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公办教育与民办教育、出国留学与来华留学、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同步发展。目前，全国有职业院校 1.2 万所，在校生 2680 万人，中职和高职分别占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建立了自考、函授、成人夜大、成人高考、广播电视大学、开放大学、慕课等多种教育渠道，人人学习、时时可学、处处可学的学习型社会加快建立。

40 年来，教育公平的步伐不断加快，每个人受教育权利得到更好更有力的保障。2008 年秋季学期起，我国实现城乡义务教育全部免除学杂费，这是我国教育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倾斜支持农村教育、中西部地区教育，实施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工程、全面改薄、教育脱贫攻坚等重大工程项目，全国超过 80% 的县实现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更多农村和中西部地区孩子享受到更好更公平的教育。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每年惠及 3700 多万人。建立覆盖从学前到研究生教育的全学段学生资助政策体系，不让一个孩子因家庭经济困难而辍学的目标基本实现。80% 以上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公办学校就读，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体系不断健全。视力、听力、智力三类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达 90% 以上。

40 年来，人才培养和科技供给水平逐步提高，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不断增强。改革开放以来，高等教育累计为国家培养和输送了 9900 万名高素质专门人才，



职业学校累计培养和输送了 2 亿多名技术技能人才。我国高校年毕业生人数从 16.5 万增长到 820 万，40 年间增加了近 50 倍。目前，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 10.5 年，新增劳动力中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超过 45%，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 13.5 年，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国家先后实施“211 工程”“985 工程”“2011 计划”“‘双一流’建设”等重大项目，我国高校在全球的位次整体大幅前移，进入世界排名前列数量显著增加，近 100 个学科进入世界前千分之一。高校承担了全国 60% 以上的基础研究和重大科研任务，建设了 60% 以上的国家重点实验室，获得了 60% 以上的国家科技三大奖励，发表科技论文数量和获得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均占全国 80% 以上，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队伍和研究成果均占全国总数 80% 以上，在载人航天、量子通信、超级计算机等领域产出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标志性成果，有力推动了创新型国家建设。

改革开放 40 年，中国教育迈入历史新征程。今年 9 月 10 日，党中央召开全国教育大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谋划教育发展的宏伟蓝图，开启了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新征程。

要深刻理解和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切实做到“九个坚持”，全面落实教育优先发展战略。要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在坚定理想信念、厚植爱国主义情怀、加强品德修养、增长知识见识、培养奋斗精神、增强综合素质等六个方面下功夫，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不断提高教师待遇，让广大教师安心从教、热心从教。要坚决破除制约教育事业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坚决克服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顽瘴痼疾，充分激发教育发展生机活力。要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把加强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不断增强“四个意识”，自觉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深入推进教育系统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

40 年艰苦奋斗，不忘初心；40 年筚路蓝缕，硕果累累。今天的中国教育已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



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化教育改革开放，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来源：《人民日报》 作者：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 陈宝生）

新时代高等教育的历史方位和发展走向

2018 年 9 月 10 日召开的全国教育大会，是在中国改革开放走过 40 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节点上召开的，标志着中国教育事业站在了新的发展起点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我们的教育必须把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根本任务，培养一代又一代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奋斗终身的有用人才。这是教育工作的根本任务，也是教育现代化的方向目标。”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新时代对教育提出的新定位、新论断、新要求，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高等教育的总纲领、总遵循、总方针。把党和国家的最新战略部署转化为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实际行动，首要的是应该把高等教育放到国内外大背景下来审视、考量和研判，充分认识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准确把握新时代高等教育所处的历史方位和未来发展走向。

一、从宏观背景审视高等教育所处的历史方位

准确把握新时代我国高等教育所处的历史方位，是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重要前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等教育发展水平是一个国家发展水平和发展潜力的重要标志”，“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方向要同我国发展的现实目标和未来方向紧密联系在一起”。这就要求从国内外都发生重大变化的宏观背景下，全面审视我国高等教育所处的历史方位。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不遇的大变局之中，虽然世界经济有复苏向好的势头，但贸易保护主义和“内顾”倾向在抬头，地缘政治格局在变化，发达国家看待我



国发展的心态也在发生变化，两面性和矛盾性越来越明显，对中国经济体量变大有担忧和紧张情绪，最近不断升级的中美贸易战就是很好的说明。我们要正确认识我国的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不能产生误判。虽然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还只是中等收入国家。2016 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世界平均水平的 80% 左右，仅为美国的 1/7，居世界第 68 位。这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也是一个很独特的现象。

我国经济不但人均水平相对较低，而且还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我国城乡区域发展差距仍然很大，在未来 3 年还有 3000 万左右农村贫困人口需要脱贫。从产业结构看，近年来天宫、蛟龙、天眼、悟空、墨子、大飞机等重大科技成果相继问世，但整体上我国的规模化生产还处在全球产业链的中低端。近期发生的芯片事件，其实不仅仅是芯片问题，我国在制造业很多方面是落后的。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对全国 30 多家大型企业 130 多种关键基础材料调研结果显示，32% 的关键材料在中国仍为空白，52% 依赖进口，绝大多数计算机和服务器通用处理器 95% 的高端专用芯片，70% 以上智能终端处理器以及绝大多数存储芯片依赖进口。这表明，我国在科技领域的原始创新能力不足的现状还没有根本改变，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还没有根本改观。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创新驱动本质是人才驱动。目前，世界各主要国家纷纷加大基础研究的投入力度，但与美国、日本相比，我国还存在较大差距。随着中美贸易战的规模和涉及领域逐步扩大，我们越来越认识到，经济与贸易的冲突，实质上是综合国力的竞争，而综合国力的竞争则是高科技产业的竞争，是自主创新能力的竞争。这些竞争根本上是高等教育的竞争，更是人才培养水平的竞争。

在这个大变局的时代，我们对中国发展既要有坚定信心，保持发展的激情和定力，又要有强烈的忧患意识，沉下心来埋头苦干。在人才和科技助推经济建设主战场方面，高等教育必须有所作为，也能够大有作为。在发生深刻变化的时代大格局中认清自我，应该从“四个战略维度”找准高等教育所处的历史方位。

1. 从国家发展的坐标来看，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石，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德政工程。新时代，我国对高等教育的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实现新的发展目标，我们对科学知识和卓越人才的渴求比以往任何时



候都更加强烈。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对于提高人的综合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不容忽视的重大意义。我国的科教兴国、人才强国、创新驱动发展等重大战略,都需要高等教育提供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撑。

2. 从国际水平的坐标来看,我国高等教育总体上已经走上世界舞台,普及水平进入世界中上行列,一些领域进入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前列。2018 年 QS 世界大学排名中,我国上榜高校从原来的 30 所增加到 40 所,6 所高校进入百强榜,其中清华大学排在第 17 位,这是首次有中国大学进入世界前 20 名。放眼全球,我们应该更加坚定教育自信,坚持扎根中国大地,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

3. 从现代化建设的坐标来看,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从 2020 年到 2035 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 1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将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提前了 15 年。但我国经济也面临着更大的压力和挑战。化解压力、应对挑战,高等教育可以发挥重要作用。高等教育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先导性和全局性地位更加凸显,在引领社会发展和推动民族复兴中的作用更加突出。

4. 从以人民为中心的坐标来看,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由大众化阶段向普及化阶段的历史性转变,接受高等教育越来越成为人民群众的普遍需求。但是,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水平同人民群众的期待还不太相契合,这对高等教育聚焦质量提升、实现内涵式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二、从机遇和挑战把握高等教育的新变化

经过长期努力和发展,我国高等教育事业走过了由小到大、由弱向强的辉煌历程,实现了从规模扩张到质量提升的历史性转折,取得了全方位的历史性成就,发生了深层次的历史性变化。梳理和总结重大成就,我们对高等教育发展更加自信,更加坚定地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扎根中国、融通中外、立足时代、面向未来,更加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但我们也清醒地看到,面对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和我国进入新时代的重大转折,高等教育既面临着大发展的良好机遇,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重大挑战,可以说是机遇和挑战并存。一方面,当今世界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重要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我国开启了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两步走”的新征程，知识和人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重要性更加凸显，大力推进高等教育强国建设，可以说恰逢其时；另一方面，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翘首可期，世界不少国家都在实施创新发展战略，我国正在朝着建设经济强国、文化强国的目标努力，人民群众对高等教育的期盼更为强烈，这些都对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提出了严峻挑战。当前，高等教育站在了发展的新起点，我们应在机遇与挑战中准确把握其前所未有的“五个新变化”。

一是高等教育从原来对经济社会发展发挥基础性支撑作用，转向支撑和引领作用并重，其地位和作用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经济发展从主要依靠资本转向越来越依靠人才，因此，高等教育应该提供更为有效的智力支撑；经济发展从依靠资源驱动转向依靠创新驱动，大学应该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主体作用；经济发展从依赖人口红利转向全要素增长，高等教育应该为改善全要素中最为关键的劳动生产率提供人才保障。但我们也清楚地认识到，从当前高等教育的结构、质量和效益来看，距离经济社会发展对其功能和作用的要求还有很大距离。这种差距，恰恰也是高等教育提升质量的巨大空间。

二是高等教育从大众化阶段向普及化阶段转变，其体量规模正在发生着明显的变化。从 1999 年开始，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进入快车道，规模迅猛增长。2017 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 45.7%，高于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事实证明，抓住机遇才能赢得未来，丧失机遇就会落后一个时代，这是很多高校经历前些年发展得出的重要启示。但短期内高等教育的快速大规模增长，带来的办学压力需要一个时期来化解，以保证高等教育的持续健康发展。这就要求在发展战略上从以规模扩张为主要特征的外延式发展，转到以质量提升为基本特征的内涵式发展上来。

三是高等教育从相对单一结构向多样化办学结构转变，其结构类型正在发生着显著的变化。现阶段高等教育存在供给与需求上突出的结构性矛盾：一方面高校毕业生数量庞大，就业难；另一方面人才供给远远满足不了产业发展需求，在产业结构调整背景下，矛盾更加突出。主因在于高等教育过分关注规模发展，而忽视了学科专业、类型层次、内外部管理等结构的调整，影响了其整体效能的发



挥。通过进一步深化综合改革，推进管办评分离、落实高校自主权、推动分类管理分类发展、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办学、优化调整高等教育结构的需求越来越迫切。

四是高等教育的对象群体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现在的大学生都是 20 世纪 90 年代、甚至是 21 世纪初出生的，迫切需要高校创新教育理念，改革课堂教学模式，提高教材编写质量，以适应他们的思维方式、认知范式和交际行为等特点。传统的以“满堂灌”“注入式”“填鸭式”为主导的课堂，不仅难以实现创造性的知识建构，也难以产生情感和价值观共鸣。只有把握好新一代青年的心理特点和认知规律，从理念和制度上真正贯彻以学习者为中心、以学生为本，才能培育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五是高等教育的环境格局在发生深刻变化。从外部的技术环境来看，以信息科技革命为先导，以新材料科技为基础，以新能源科技为动力，以空间科技为外延，以生命科技为战略重点，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全方位科技革命，给世界各国都带来了重大而深远影响，有的影响甚至是颠覆性的。如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人机协同将使部分职业被替代甚至消亡，同时又会产生新的行业和职业。高校的人才培养目标、专业结构和课程体系都应随之改变。从国际环境看，我国高等教育总体上正在日益走向世界教育的中心，未来高等教育将更多地参与国际竞争与治理。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深入发展带来教师和学生的跨国界流动，也促进我国大学更加注重教学科研水平的提高，在日益激烈的竞争环境下，必须形成富有活力和特色的高等教育中国模式，才能在全方位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三、从服务国家需要研判高等教育的发展走向

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是大学的使命，是高等教育的职责。当前，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高等教育的需要、对科学知识和优秀人才的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我国是教育大国，还不是教育强国，也不是高等教育强国，我们仍处在一个“将强未强、要强还不强”的阶段。我国高等教育正处在加快推进现代化的关键时期，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路还很长，任务还很艰巨。我们要以党的十九大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为统领，紧紧围绕服务国家需要，朝着“四个更加”的发展方向不懈努力。



一是更加坚持党的领导这一根本。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是办好教育的根本保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各级各类学校党组织要把抓好学校党建工作作为办学治校的基本功，把党的教育方针全面贯彻到学校工作各方面。”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要牢牢把握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着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不能只教书不育人、轻视育人工作，甚至放松思想政治教育、弱化党对高校的全面领导。

当前，加强学校党的建设，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把高校建设成为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坚强阵地。要全面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坚持“围绕中心抓党建、抓好党建促中心”的工作原则，把基层党建工作和教学科研、社会服务等有机结合起来，形成强大工作合力。要全面提升高校治理能力和水平，坚持和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把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领导体制运转好；学习借鉴世界各国办学治校的先进经验，把各级各类学术组织的独特作用发挥好；把高等教育改革的经验总结好，形成广大师生共同参与、民主管理与监督并重、社会各界大力支持的良好发展格局，全面提升高等教育治理能力和水平。

二是更加紧扣提高质量这一主题。质量是高校发展的生命线。考察一所大学办得质量高不高，要以长远眼光和历史视野看它的人才培养质量，看它培养出来什么样的杰出人才，尤其是其毕业生为国家、民族和社会做出了多么大的贡献；而不是看它一时的发展规模和数据，不是看它能够拉动 GDP 几个百分点，也不是看它能够产出多少篇 SCI 文章。当前，高校坚守质量这条生命线，就是要把人才培养质量作为生存和发展的命脉，进一步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不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完善高质量人才培养体系，强化特色发展，提升内涵品味；力戒一味扩规模、上专业、改校名、提规格，不顾实际地盲目攀高或者求全求大。

三是更加突出服务需求这一导向。众所周知，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大学应该始终与国家民族同心同向，应该始终以国家强盛、民族振兴为



使命担当,突出服务国家需求这一根本价值导向。这是一所大学能够长期强劲发展的根本动力,也是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一个普遍规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方向要同我国发展的现实目标和未来方向紧密联系在一起,为人民服务,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具体来讲,一所大学的发展不能闭门造车、关门办学,也不能惯性思维、固化模式、缺乏社会担当,脱离国家和社会的实际需要办学;而是应该主动适应产业发展趋势、经济转型升级需要,坚持服务国家发展战略、服务地方建设需求,更好地发挥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和引领作用。

四是更加激发深化改革这一动力。针对改革进入“深水区”所面临的重大矛盾,着力破除体制机制层面的障碍,将发展经验固化为规章制度,将实践探索转化成体制机制,以综合改革驱动创新发展,以攻坚克难激发办学活力,真正解决好高等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根本性问题,而不是拘囿于原有利益格局,固守原来的模式套路,空喊口号不作为,缺乏应对挑战和解决矛盾的内在动力。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加快,高等教育亟需调整基本结构,实现转型发展,积极适应全面深化改革的新要求,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高素质人才。我们应该站在国家大局高度,认真审视这些重大而紧迫的时代课题,深刻理解“转型发展”的重大意义和实质内容,把办学思路真正转化到服务国家需要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上来,把教育目标转到培养国家和社会需要的各种类型人才上来,把教学重点转到增强学生创新创业的综合能力上来。

面向新时代,我国高等教育从哪里来、向哪里去?这个问题尖锐地摆在了我们面前,要“低头看 5 年,抬头望 10 年,走起路来想着 30 年”。也就是说,我们应该从新时代这一历史方位出发,作长远谋划,谋定而后动,全面系统加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顶层设计,把提高质量、实现内涵式发展作为核心任务,扎根中国大地、办好中国特色高等教育。

(来源:《中国高教研究》 作者: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教育部原党组副书记、副部长 杜玉波)



• 高教之道 •

地方高水平应用型大学建设的思考与实践

——以合肥学院为例

高等教育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综合竞争力和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新时代，我国高等教育领域综合改革不断深化，“双一流”建设大力实施，同时，地方高校应用型发展政策不断完备，地方应用型大学正面临推进高水平建设的难得机遇和良好氛围，办学活力不断释放。合肥学院（以下简称学校）长期致力于应用型发展模式的探索与实践，在与德国长期合作的基础上，通过不断深化改革创新，走出了一条符合自身实际的高水平应用型大学办学之路，取得了一定成效。

一、着力“八个转变”，深化内涵建设

2003年，学校率先提出“地方性、应用型、国际化”的办学定位，并且在全校得到实施。在过去的十五年中，学校一直不断在对高水平应用型大学的体系化建设进行探索，着力突破同质同构，系统构建了“八个转变”应用型大学建设理论与实践体系。

1. 办学理念向“应用型”转变

为突破高校同质同构的问题，2003年，学校提出建设“地方性、应用型、国际化”的办学定位，通过国际化的理念、思路 and 平台推动学校发展，同时改革创新人才培养模式；2010年，针对应用型本科是否是高等职业教育问题，提出坚持以“科学为基础，应用为重点”；2013年，针对高水平应用型大学建设，提出要坚持应用型定位，深化“校企合作，产学研合作”。

2. 专业结构向“需求导向”转变

为使学科专业服务区域发展，与区域产业结构对接，学校根据社会需求设置专业；突破学科定势，设置新专业；根据模块化教学体系，增加专业社会适应性。例如：围绕合肥市支柱产业，学校及时调整设置机械电子工程、物流管理、会展



艺术与技术、交通工程等新专业，强化对区域产业发展的支持。目前，学校专业密切对接合肥八大支柱产业；根据企业对复合型人才的需求，设置学科交叉专业，如创办目录外专业—经济工程专业（已通过德国专业认证），培养既懂技术又懂经济的管理人才；采用模块化教学体系，如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和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共建嵌入式硬件拓展模块，满足企业对该领域人才需求。

3. 培养模式向“产教深度融合”转变

产学研合作育人是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必由之路。应用型高校要建立“全过程、一体化”产教深度融合的人才培养模式，把产教深度融合贯穿人才培养的全过程；要从人才培养方案制定、人才培养过程、质量保障体系等各环节实质融入，推进一体化的建设，而不仅仅是一个口号和概念。实践中，不同类型的高校应该有不同定位、目标、路径、方法。

4. 课程体系向“能力导向”转变

实现从“知识本位课程体系”向“能力本位课程体系”的转变，即不过分强调学科知识的系统性和内在逻辑性，以专业为导向，以职业或行业所需的知识、技术或技能为中心，注重将理论知识与实践知识有机融合起来。这是非常重大的一个改变，要求基础课要适用，课时适当下调；专业基础课要管用，优化和整合课程内容，降低重复性；专业课要理论联系实际。

同时，学校提出了“课程结构模块化”的新教学理念，并已经完成了 25 个专业的课程结构模块化教学改革。“模块化教学”坚持能力导向的教学理念，转变传统人才培养的“知识输入导向”为“知识输出导向”，关注的是学生学完一个模块以后就能获得哪些方面的能力，而不是教师要讲什么。学校不断完善构建模块化课程体系的逻辑步骤，即深入行业企业调研→确定专业核心能力→分解为若干个子能力→确定子能力的知识点→构建模块→组建模块化课程体系，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当前，学校正在不断深化拓展模块化课程体系改革，增加了“关键能力”模块，把专业以外的、学生适应职场发展的重要能力纳入进来，如交流能力、沟通能力、表达能力、协调能力等；还把创新创业实践、“双师型”课程、企业课程融入到整个教学模块当中，提升学生适应职场和创新创业能力。同时，在课程开



发和构建中引入行业最新技术及规范，将理论和实践进行整合，形成模块化课程教材。

5. 教学过程向“以学为中心”转变

落实“以学为中心”理念，从制度、方法、考核和保障上，系统构建教学新机制，促进“教”与“学”的统一。

第一，理念。将传统的“以教为中心”转变为“以学为中心”，由以往只关注对教师“教”的考核，转变为更加重视对学生“学”的考核，围绕激发学生学习内驱力和全面发展、个性化发展，设计教学制度体系。

第二，制度。将过去以教师“教的工作量”为核心的学分计算方法，改为以学生“学的学习量”为核心的学分计算方法，有效规划学生课内外学习，有目标地指导学生自主学习。不同类型高校要结合实际建立不同学习量的基本办法与标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第三，方法。积极开展教学方法改革，引进了很多以学为中心的教学方法，如项目教学法、翻转课堂、项目式学习（PBL）等。在这些教学方法改革过程中，履行教育教学任务的教师尤为关键。

第四，考核。注重过程考核，同时重视对学生自主学习效果的评价，不断完善自主学习考核方式、内容，实现从单一知识评价向以能力评价为主的多元化评价、综合性评价转变，促进学生自主学习。

第五，保障。建立以学为中心的服务体系，鼓励学生开展团队学习、合作学习、自主学习，加强信息化、图书馆、教室、实验室管理，实施开放制度，为学生的学习提供保障。

6. 师资队伍向“双能型”转变

“双能型”教师是指教师需具备教学能力和产学研合作能力。例如：德国要求应用型大学教师必须博士毕业且有五年以上企业工作经历，瑞士要求应用型大学教师必须博士毕业且具有10年以上企业工作经历。所以，如何把“双能型”师资队伍建立起来，企业工作经历非常重要。为打造“双能型”师资队伍，学校采取了鼓励教师开展产学研合作、引进具有企业工作经历的教师、教师到企业挂



职锻炼等办法，同时，制定了“双能型”师资认定标准，实施了教师能力提升计划。目前，学校专业课教师“双能型”占比 56.46%，工科占比 64.29%。

7. 资源保障向“两个开放”转变

资源对地方高校非常重要，要在三方面实现资源保障向地方和国际开放。在师资队伍方面，要实施对国外高校、行业企业的“开放式引入”。在平台建设方面，要搭建高水平产学研合作平台，依靠平台申请科研经费和进行人才培养。在资金支持方面，扎根地方土壤，以服务求支持，以贡献求发展。

8. 质量评价向“两满意”转变

建立 25 个主要环节质量标准，将学生评价、毕业生跟踪调查、用人单位走访、招生就业评价、第三方评价等纳入评价体系，实现内部评价向内外结合转变。实现人才培养质量观的转变，把“学生满意”和“社会满意”作为人才培养的质量标准。

二、着力平台打造，履行使命担当

1. 打造高水平产学研平台，服务区域创新发展

地方高水平应用型大学一定要打造高水平产学研平台，服务区域创新发展。学校和地方政府密切合作，安徽省巢湖污染治理研究院建在学校，和世界十大环保集团之一的德国欧绿保集团共建中德固体废弃物研究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固废处理、环巢湖治理、电子垃圾处理、汽车垃圾处理等。与德国下萨克森州共建中德环境技术转化中心，与德国柏林水务公司等一批在华的德资企业全面合作，促进环境技术在中国的转化。在工业设计方面，与深装融电集团共建研发中心、产学研合作中心，学生在中心真学真做，培养高素质工业设计人才，促进工业设计创新与技术融合。

2. 打造高水平科学研究平台，传承发展区域文化

地方应用型高水平大学要坚守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传承地方文化。学校传承研究合肥文化，先后做了刘铭传研究、朱子研究、淮军文化研究、环巢湖文化研究、合肥文化研究、廉政文化研究、合肥旅游研究等。承办了“海峡两岸（合肥）纪念刘铭传首任台湾巡抚 130 周年学术研讨会”，编撰了《大湖名城—合



肥地域文化研究丛书》、承担“传统文化传承、创新与价值转化”重大项目《大湖名城—合肥文化十讲》。

3. 打造高水平国际合作平台，推动区域开放发展

地方高校要站在国际化的平台推动区域的开放发展。安徽省委书记李锦斌认为，安徽对德国合作有“三大”重点，即大众汽车、大陆轮胎、大学（合肥学院）。学校与德国、韩国、日本、美国、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爱尔兰等国家的六十多所高校建立了合作交流关系，建立“中国安徽—德国中心”和“中国合肥—韩国中心”，帮助合肥市与德国奥斯纳布吕克市、罗斯托克市、韩国瑞山市结为友好城市；助力黄山市与德国施特拉尔松德市结为友好城市。此外，学校和全球中小企业联盟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协助安徽省承办世界制造业大会；协助合肥市引进德国大陆集团轮胎公司、西伟德集团；协助合肥市引进“韩国城”等项目。

近年来，学校先后成功举办了十届“中德应用型高等教育研究与发展论坛”、五届“环境知识与技术转化国际会议”以及“面向 21 世纪新农村建设中韩学术研讨会”“2007 旅游教育与旅游管理亚太国际论坛”、国际节能技术建筑平台会议一系列国际学术会议。2016 年 8 月 30 日，德国总理默克尔为安徽省在西欧的第一所孔子学院—由学校共建的施特拉尔松德孔子学院揭牌。

三、着力办学效益，提升实力水平

1. 本科生培养质量高，社会声誉好

地方应用型大学要积极鼓励学生参与各类学科竞赛。近五年来，学校在校生获省级及以上奖 2,403 项，其中国家奖 779 项，国家级及以上科技创新类奖 296 项；全国普通本科类高校团学创业教育 45 强；获省级及以上创新创业项目 1,991 项，获省级“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赛奖项 41 项，国家级铜奖 6 项。

2. 学校社会声誉不断提高，招生形势好

学校 2015 年和 2016 年文科、理科招生均位居省内二本批次高校第一。2016 年，部分专业列入一本招生。2017 年，主体专业进入一本招生。2018 年，整体进入一本招生。学校本科毕业生就就业率连续多年位居全省前列，



连续三年被评为全省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先进单位，被授予“全省就业工作标兵单位”。学校成功入选“全国第二批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示范高校”。

3. 在全国应用型人才培养中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2009年，教育部高教司来学校调研，形成了《有关合肥学院等地方院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调研报告》，将学校应用型人才培养改革总结为七条经验、三点认识和四条建议。2015年，教育部第63期《简报》做专题推广。2017年，《中国新建本科院校质量报告》将学校经验专题总结为“安徽现象，合肥模式”。全国527所高校、1,300余批次来校调研。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教育厅（委）高教处处长集体来学校考察。学校作应用型人才培养报告32场，创办《应用型高等教育研究》，搭建国际交流和研究平台。安徽省教育厅、长三角地区分别成立了以学校为常任主席单位的安徽省应用型高校联盟、长三角地区应用型高校联盟。

（来源：《北京教育》 作者：合肥学院党委书记 蔡敬民）



大学的新形态与卓越追求

交互大学的典型特征是大学组织及其成员的跨国跨界流动和融合，形成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新特征。在交互大学时代，与学术卓越、国际理解和社会责任三大基石相对应，世界一流大学要助力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大学需要树立世界意识和国际视野，要努力在世界范围内建设卓越学术共同体、青年发展共同体和社会责任共同体。

从最广泛的意义上看，大学从成立之日起就承担着一定的社会责任。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需求发生变化，大学内外的人群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大学的社会责任呈现出新的形式和内容。特别是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大学的地位更加凸显，大学承担着更大的社会责任。随着全球化和逆全球化的双向对冲，大学深切意识并且践行这种社会责任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迫切性和重要性。

从学院、大学、多元巨型大学到交互大学

知识的流动形态与大学变迁的轨迹

作为一种特殊组织机构，大学的出现和知识的创造与流动相关。按照已有的文献和分析，沿知识的传递、传播和转移，大学经历了三个阶段：由学院（College）到大学（University），再到多元巨型大学（Multiversity）。学院的主要任务是通过知识的传递培养人才。从最初与人生关系最密切的神学、医学和法学三大板块（神学涉及人的精神生活，医学涉及人的生理基础，法学涉及社会秩序）逐步扩展。曾在牛津大学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就读、后来创建爱尔兰天主教大学的红衣主教亨利·纽曼的《大学的理念》，是对学院大学教育理想的经典概括。早在 19 世纪初，德国语言学家冯·洪堡筹建柏林大学，他提出科研和教学并重的思想，凸显学术研究的地位，强调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的大学精神。19 世纪的德国大学成为其他国家纷纷追随的样板。美国虽由《莫里尔法案》的颁布开启赠地办学运动，独树一帜，但是大批大学办学人依然游学德国，接受研究型大学的理念洗礼。如果说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威廉·玛丽学院等在 19 世纪还保持学院的特色，那么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诞生，就标志着研究型大学在美国取得



突破。进入 20 世纪之后，以“威斯康星思想”为标志，美国大学再发力，大学的社会服务功能成为与教学、科研并驾齐驱的第三功能。

社会服务功能的新使命，激发了大学活力，释放了大学知识转移的能量，大学的规模因此也不断扩张，组织变得日益复杂，导致“多元巨型大学”概念的诞生。美国学者克拉克·科尔的《大学功用》从大学治理精英的眼光出发，描述了多元巨型大学的新兴特征。正像研究型大学一样，多元巨型大学作为一种大学形态，引起许多学者的兴趣。欢呼与担忧并存。哈尼特的《三种文化与巨型大学之殇》、马金森的《世界一流巨型大学：全球共性与国家特色》，分别从独特视角观察，贡献了对多元巨型大学的新论述。

21 世纪中国大学奋起追赶，一方面强调大学的文化传承功能，另一方面又重视国际交流与合作，在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的基础上，二者并列为大学的新功能。大学功能的演化是对社会环境变化的反应，既是事实性描述和概括，也是价值性指引和向往。在经济全球化、信息化和市场化大背景下，大学由学院、大学、多元巨型大学演化到新的形态——交互大学（Interversity）。就交互而言，大学教师和学生的流动是一个方面，跨国跨境跨行业合作研究和联合办学是另一个方面，诸如欧洲的博洛尼亚进程、伊拉斯谟计划、中国的中外合作办学，就是交互大学新形态的表现例证。

交互大学的典型特征是大学组织及其成员的跨国、跨界流动和融合，形成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新特征。组织的数字化、网络化以及“慕课”（MOOCs）的出现，助推了交互大学的发展。截至今年 8 月，我国目前经审批、复核及备案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共 2365 个，其中本科以上独立法人机构 9 家。大学和社会其他机构，特别是企业的合作共建更是各有路径，呈现出交互大学的样态。

世界一流大学是一种向往、一种能力、一种行为、一种结果

世界一流大学的界定：“所是”还是“所为”？

交互大学是在世界一流大学话语背景下出现的新型大学形态。它融合了学院、大学和巨型大学的成分，同时增加了更多国际化和社会化的因素。大学的国际发表水平、教师和学生流动状况和国际显示度，是许多流行的大学排行指标的观察指标。我国的“211 工程”和“985 工程”，再到“双一流建设”，都把世界上一



流名校作为参照和目标。在 2015 年《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中，国际交流合作还在五大改革任务的行列。到了 2017 年的《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暂行）》，在遴选条件中，国际交流合作已被提到与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和师资队伍建设并列的层次。学界和高等教育界普遍认为，国际交流合作是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观察点。

对国际交流合作的重视，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交互大学的样态特征。但交互不限于国际大学间的交互，还包括大学和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等机构和部门的交互。越是办学水平高、知识存量和增量丰盈的大学，交互范围越广，能力越强，交互程度越深。因此可以说，极强的交互性是世界一流大学的一个重要特征。

在不明白一流大学是什么的情况下，事实上是无法建设一流大学的。从组织行为的角度看，一流大学建设涉及从个体到组织的各个层面，可以概括出以下几个命题：世界一流大学是一种向往、一种能力、一种行为、一种结果。

一流大学是一种向往。一流大学不是给定的身份，而是一种努力的方向、目标和向往。它不是，至少不应该是，带有荣誉性身份特征的固定符号。被选入重点支持的大学，当然首先就应该有更高、更强烈的向往和抱负。其他没有列入一流大学支持计划的大学，难道就没有追求一流的权利、资格、使命和责任？不是。资源配置的权宜安排，并不意味着追求一流仅仅是少数几所学校的特权。作为一种向往，任何一所大学，都应该有追求卓越的激越梦想和自我激励。作为一种向往，一流大学首先要解决“想要”的动力问题。

一流大学是一种能力。光喊口号是没有用的，建设一流大学必须有能力作为保障。大学能力是决定大学组织目标实现的重要条件，是由个体、团队和组织等不同层面主体所赋有的能力的组合。大学拥有的各级组织治理体系及其能力，资源总量和新资源动员的能力，大学个体、团队和总体的思想和做事能力等，构成能力组合，涉及大学的软硬实力。就人的因素而言，个体能力是大学能力的重要构成，但是大学能力不是个体能力的简单组合。大学组织的复杂性，要求不同层次的能力倾向应和岗位责任匹配。大学的战略规划能力、学科发展能力、筹资能力等，都是建设一流大学的保证。其中，组织学习能力是大学持续发展的一项非常重要但是往往被忽视的能力。一流大学不是“天生”的。有的大学建设历史并



不长，但是后来居上。有的大学建校历史很久，但是始终能够随着时代发展不断“向潮头而立”。为什么？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大学具有很强的组织学习能力。

一流大学是一种行为。“睡着觉”和“压抑着”的能力只是潜在的能力。建设一流大学需要行动。个体行为是一流目标得以实现的基础，在某些特定任务方面，个体行为决定大学一流的表现。注意力如何分配，时间如何分配，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着个体的行为特征。在多重任务争夺个体时间的情况下，个体如何选择，反映出深度假设和深层的价值偏好。在团队层面，个体之间的合作起关键作用。在大学亚组织（学院和机关）和组织层面（大学总体），组织文化和气候是大学行为的主要表征。精神塌陷、权力霸凌、山头林立、人格扭曲、明争暗战、士气低落、心浮气躁的组织，不可能有一流的表现。营造一流组织氛围，创建一流大学文化，让卓越成为一种个体习惯，让合作成为组织内部人际互动的常态，让天赋才华和激情梦想竞相绽放，是一流大学建设的重要任务。

一流大学是一种结果。大学再有抱负、再有能力、再有行动，如果没有一流的产出，都称不上是一流大学。知识的传递、创造和转移是大学的基本行为。未来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人类知识边缘的切割和知识创新成果、知识在人类发展和社会建设中的应用转化价值，是大学的产出形式。从结果观察大学的一流绩效，存在现实困难，大学的产出是多方面的、错综复杂的。有的结果易于观察，但是还有很多结果不易观察；有的结果短时间内就能看到，但有的结果显现出来需要很长的时段；有的结果的生产主体相对单一，但有的结果的生产主体层层叠加，难以厘清，如此等等。特别是大学是“人的存在”，也是“文化的存在”，大学里人的发展和文化发展也是非常重要的结果。许多评价和排行看重绩效表现，通过“高买”拥有名号的教授可以达到短平快提高评价表现的作用，但是可能恰恰因此也破坏了需要经年累月建构和呵护的和谐文化。

哪些是大学绩效的关键指标，众说不一。可以说，几乎所有的评价指标体系和排行榜都是有缺陷的。爱因斯坦曾指出：“并不是所有重要的事情都能计算，同时，并不是所有能够计算的都重要。”就我国当下的语境看，“立德树人”这项大学的重要任务，如何在各类评价指标体系和排行榜中突出体现，是仍需探索



的难题。克服“排行榜综合征”，回归“实体办学逻辑”，在各类产出的质量上下苦功，是一流大学建设中保持清醒意识的必要警示。

学术卓越、国际理解和社会责任

人类命运共同体语境下世界一流大学的三大基石

大学诸功能发挥如何，需要多重参照考察。有大学立足的社会土壤和需求，也有大学置身其中的国际坐标。以世界知识地图为参照系，可以确定大学的位置。

在知识日益分化和综合发展的今天，用统一的国际分类及其标准评价民族国家的知识状况是困难的。长期以来，“天人合一”的理念是我国生生不息的文化基因，仁义礼智信是传统文化的重要价值。将天地人融为一体观察、思考和论说，是基本的智识方法。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政治学、伦理学、物理学等经典文献，反映了知识和自然、社会领域勾连和分化的特征。康德的“星空与良心说”，是对知识界所面对的自然和人文界面的分野。新康德主义的代表李凯尔特将自然科学和文化科学相对照，进行了哲学层面的分析。作为科学工作者和小说作家的 C. P. 斯诺的小册子《两种文化》出版之后，许多学者参与了两种文化的讨论。虽然后续还有三种文化的提法，但是总体上看，人类心灵中存在的情感与理性的差异，人类理性中存在的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差异，人类生活中面对的自然和人文社会世界的差异等，决定了知识形态和生产创造路径的不同形式。工业上的四次革命无疑和科学的进步有关，自然科学的革命与人类“征服自然”的凯旋相呼应，但人文社会学科的发展并没有和人类精神的上升完全辉映。人类的命运不仅仅取决于自然科学的进步，更取决于人文精神的状态。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就是对人类共同的精神境遇的关注，是对世界秩序变得日益复杂和不确定的积极反映，这对大学的使命和责任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

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不能离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想自说自话。学术卓越、国际理解和社会责任是一流大学的三大基石。

追求学术卓越即不断挑战人类认识极限，切割知识边缘，实现科学创造的重大突破。

国际理解建基于人际理解、社区理解、社会理解，在跨境、跨国互动过程中达到相互理解、欣赏和尊重。族群意识、族群思维，自我中心主义和民粹主义，



是国际理解缺失的表现，也是国际理解的障碍。文学家约翰·斯滕贝克曾说，“要尽力理解别人。如果相互理解，就会彼此友好。如果能够深度理解一个人，就不会心生仇恨，相反会滋生更多的关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全球社会测量计划”中提醒：“如果没有对现实的共享理解，要进行有成效的民主辩论是不可能的。”促进国际理解，是当下许多国际组织共同勉力提倡和推动的重要价值理想。

与此同时，社会责任，尤其是世界一流大学的社会责任，也受到广泛关注。社会责任中的社会是相对概念，既包括民族国家内部的社会构成，也包括国际版图中的社会形态。相应地，大学的社会责任既包括本国的社会责任，也包括国际社会。在交互大学时代，世界一流大学不可能封闭在一国一隅的小圈子里建成。关门办学没有出路。与三大基石相对应，世界一流大学要助力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要树立世界意识和国际视野，要努力在世界范围内建设卓越学术共同体、青年发展共同体和社会责任共同体。通过共同体的建设，促进人才和知识在国际社会更广泛地流动，培养具有人类命运情怀的未来世界领袖，将人类所面临的共同难题纳入大学科学研究的视野，协力面对地方性、全球性的现实和潜在灾难、挑战，是现代大学的责任，更是世界一流大学的社会责任。

（来源：《中国教育报》 作者：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周作宇）



• 国际教育 •

大学的传统与改变——德国高等教育一瞥

大学是与时俱进的。本文记录了作者在参访德国的 9 所大学和 6 个相关机构后对大学的传统与改变的一些收获与感受，解析了德国综合性大学在十分看重和强调威廉·洪堡 1810 年代建立的研究型大学的三个传统——为学生提供综合的教育，研究与教育合一，学术独立和学术自由的同时，如何做出改变，从而在适应时代的同时加深传统，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1. 为学生提供综合的教育

德国的大学主要分为综合性大学和应用科学大学，综合性大学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而应用科学大学则只有本科和硕士学位授予权。近年来，这种情形有所改变，开始有应用科学大学与综合性大学联合培养博士的探索；2015 年黑森州议会执政党团正式批准了新的高校法，允许州内科研实力较强的应用科学大学独立授予博士学位。具体而言，德国高等教育学制和学位体系的改革，基于 1999 年 29 个欧洲国家在意大利博洛尼亚签署的“博洛尼亚进程”，其主要内容包括：建立容易理解以及可以比较的学位体系；建立本科和硕士为基础的高等教育体系；建立欧洲学分转换体系（一个 ECTS 学分意味着 25 个学习小时，其中包括 5 小时的上课时间，12 小时的课外作业和社会实践，7 小时的老师辅导，1 小时的考试）；促进师生和学术人员流动；保证欧洲高等教育的质量；促进欧洲范围内的高等教育合作。改革前，德国只有硕士和博士两级学位，没有学士这一层级。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德国大学已经发展为“3+2+3”的学士、硕士和博士三级学制和学位体系。这一改变，对于德国大学融入世界高等教育体系，实施国际化战略创造了条件。

可以说，改变为本、硕两层学位体系为学生学习提供了更广泛的机会。在“博洛尼亚进程”近 20 年后，盘点德国的高等教育可以发现：“博洛尼亚进程”倡导的学士、硕士两层学位体系带来的结构变化驱动了对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的重新思考；进一步的讨论集中在“教育”的未来和个性化发展方面；德国大学校长联



席会议深信，博洛尼亚达成的目标是对现存挑战的正确回应，但是还有进一步的工作需要完成。2013 年，德国大学校长联席会议对博洛尼亚进程中的欧洲教育改革，又提出了几点推荐建议：更关注学生（从教向学转变）；关注学习成果、技能导向和资格框架；增加学生群体的异质性对于高等教育机构来说既是挑战又是机会；增加学习的社会维度；特别需要适当的资助。目前争论的问题是：德国到底需要培养多少大学毕业生？

另外，州政府、联邦政府和德国大学校长联席会议等相关利益方，也加大了支持力度改进内部质量保障。对于外部质量保障，德国大学正在从专业和系统的认证发展到整个学校的审核评估；2015 年欧洲也正在修改欧洲标准和指南。此外，德国大学日益重视国际化办学，德国大学校长联席会的国际化战略基于以下两个假定：大学是跨国界的行动者，在其各项活动的所有维度中，一所大学必须认识到其自身是世界高等教育体系中创造性的一部分；只有国际化的大学，才能够满足社会的期待，主动地参与全球化过程，才能保障其竞争力。德国对于大学国际化的政治支持很高，特别是在联邦政府层面有政策支持和财政奖励。大多数德国大学已经发展或正在制定国际化战略。在这个过程中，国际化的动机有以下几个方面：提高教学、学习和研究质量；教育毕业生成为负责任的行走世界的人；吸引优秀学生和研究人员；提高机构在全球范围的声誉；跨文化交流、全球责任与“软实力”等。目前，德国大学在世界范围内的合作伙伴超过 32000 个，双向的国际化道路使德国已成为跨国教育方面的“全球玩家”。它是世界上第四个最受欢迎的高等教育主办国，在世界范围内排在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之后，位于非英语国家首位。同时，流动的德国学生人数 2012 年上升到 138500 人，前 7 个目的地国家为：奥地利、荷兰、瑞士、英国、美国、法国和中国。此外，一些各国机构提供的跨国教育在德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框架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合作的模式中考虑了东道国的教育兴趣和传统。目前大约有 25000 名学生在国外的德国高等教育项目中学习。虽然并不是所有的学生都想流动，但本地教育的国际化已深入人心，相关理念和做法包括：大学必须提供国际化和跨文化的学习机会，课程的国际化理念，提供在国际学生群体中学习、在异质群体中教与学的理



念，用外语教学，为学生和学术人员提供外语学习便利，开展接触异质性和跨文化能力的培养。

2. 研究与教育合一

传统上，德国综合性大学的研究水平总体上相当高而且相差不大，从政府资助方面，大学也都是被等同看待的。但是这些年德国大学在国际上的排名逊于英美甚至亚洲一些大学。近 20 年以来，政府通过加大第三方科研资助的份额来加强高校的研究能力，第三方资助的份额从 1998 年的 14% 逐年增加，2013 年达到 25%。其实，所谓第三方资助经费的最主要来源，还是联邦政府，只不过是通过第三方机构来独立实施，增加了竞争性。

2006 年，德国政府和高校再也耐不住寂寞，推出卓越大学计划，希望促进大学顶级的研究，提高大学质量，增强国际竞争力。计划从 2006 年到 2017 年，分两个阶段实施，44 所大学得到不同程度的资助，资助经费合计约 46 亿欧元。计划分三个方向进行资助：卓越研究生院——旨在鼓励和提升年轻博士研究生（每项每年 100-200 万欧元，5 年，大约可以资助 15 个博士研究生位置）；卓越研究集群——旨在促进世界级的特别是综合性跨学科研究（每项每年 500-700 万欧元，5 年）；卓越大学计划——旨在提升大学顶级研究水平（每项每年 2100 万欧元，5 年）。一所大学必须至少有 1 个卓越研究生院和 1 个卓越研究集群，才能入选卓越大学计划。值得注意的是，卓越大学计划是动态调整的，一期进入卓越计划的 9 所大学，在第二期有 3 所大学未能得到连续资助。该卓越计划是联邦政府与州政府的一项特殊资助计划，每期 5 年，资助经费 75% 来自联邦政府、25% 来自州政府。整个计划的评审与实施，主要由德国研究基金会承担，联邦政府的科学委员会参与。为了保证评估的独立性，评估专家全部来自国外。

对于卓越大学计划的评价，一般认为，其具有正面积积极的影响、值得继续进行，但是科教界对于实施的方式有很多讨论，对于 2017 年之后卓越大学计划的展望，存在以下争论的问题：是否继续保持资助的强度与水平？是继续资助“卓越”、还是“更广泛参与”？是仅资助“研究”、还是资助“研究+教学+转化+……”？是资助区域的中心还是分布式网络？大学或者其他研究机构的作用？是资助有限



周期的项目还是资助整个大学？是公开征集还是聚焦主题？是由联邦政府还是州政府提供资助？科学与政治因素在决策中的作用？

为促进大学与工业界合作开展创新研究，近年来，联邦政府教育与研究部设立了“前沿领先研究集群”项目，已经支持了 15 个集群，最近新设立了“国际前沿领先研究集群”项目。同时，还设立“研究园区”，支持了 9 个公共机构与私立伙伴合作的中长期项目，培育创新。与此同时，德国政府在里斯本策略框架下，促进欧洲区域的研究与合作。德国大学校长联席会推出德国大学的“研究地图”，请每个大学最多推荐 8 个重点优先研究方向（每个优先方向不少于 25 位教授参与），共推荐来自综合性大学的 344 个重点优先研究方向。与此同时，2014 年，应用科学大学推荐了 153 个重点优先研究方向。

德国的研究与创新体系，包括两大支柱，一是综合性大学与应用科学大学，另一个是非大学的研究机构，如马克斯普朗克研究会等。国家公立研究机构与大学有着密切的合作关系，以尤里希研究中心为例，该中心与超过 10 所大学建立合作关系。目前，该中心与大学联合聘任的教授总人数达 111 位，这些合聘教授在大学和尤里希研究中心都分别有研究室。同时，这些教授在大学招收的 540 位博士研究生在中心的各位教授的研究实验室从事研究工作，完成论文后被各自的大学授予博士学位。实际上，马普研究所也多设在大学内或附近，马普研究所自身可以招聘博士后研究人员，但是只有综合性大学才可以招收博士生和授予博士学位，研究所一般通过与大学合作培养博士生加强科研合作。

3. 政府管理和学术自由

根据德国宪法，高等教育管理权属州政府，按照联邦统计数据，州政府拨付大学基本的核心经费达生均每年 7300 欧元，按平均学习期限生均 3 万欧元，2013 年合计资助 218 亿欧元；联邦政府主要通过第三方对大学的研究进行资助，按新修订的联邦与州达成的高等教育协定，联邦政府也可以直接资助大学，2013 年联邦政府对于核心基金的合计资助为 49 亿欧元。两者合计 267 亿欧元，高校所得到的核心经费约占当年 GDP 的 1%。德国对于大学的公共资助模式试图平衡以下三个目标：一是保障基础资金、稳定性、自治和多期规划视野；二是创建竞争性、事后奖惩、绩效导向；三是引导有针对性的激励、促进战略、“创新+卓越”的事前



资助。基于三个目标的平衡，导致联邦和州政府公共资助体系的复杂性：联邦政府以卓越大学计划、高等教育协定（支持招收更多学生）、竞争性针对性资助（如教学质量）、DFG（德国科学基金会）研究项目资助、研究项目的运行管理费用等几个渠道资助大学；而 16 个联邦州政府则通过大学整体基本资助、项目资助和联邦资助的配比等几种方式资助大学。

在大学外部，联邦政府与州政府依据《德国联邦宪法》和《德国高等教育总法》等法律法规对大学实施间接的管理和监督。在大学内部，德国宪法保障的学术自由影响到大学内部的治理理念和组织结构，大学实行教授治校。校长和院长基本上从教授中产生，自我管理，主要通过民主协商达成共识。德国大学层面的治理结构由三个重要部分组成：理事会或校董会，担负决策职能；校长办公会，担负行政职能；校评议会或校务委员会，担负立法职能。德国大学中的学院（Faculty），有些类似美国大学的学部，其院务委员会是学院民主管理、教授治校的基本载体，是学院的所有重大事务的最高决策机构，也是监督学院院长工作的机构。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 高松）



• 课程思政 •

课程思政建设必须牢牢把握五个关键环节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各类课程都要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在这方面，上海市近年来推行的“课程思政”改革提供了一套有价值、可推广的“上海经验”。目前全市“课程思政”整体试点校 12 所、重点培育校 12 所、一般培育校 34 所，基本实现全市高校全覆盖。各高校已建设“中国系列”课程近 30 门，综合素养课程 175 门，近 400 门专业课程申报开展试点改革。

笔者长期从事高校思政教育，也参与“课程思政”教学改革，并承担了 2017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课程体系研究”的子课题研究任务。从认识和实践上认为，要确保“课程思政”教育教学改革取得预期成效，应当着力抓好五个关键环节。

“课程思政”建设的基础在“课程”。没有好的课程建设，“课程思政”功能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为此，尊重课程建设规律，切实强化课程建设管理是“课程思政”建设的根本基础。在这项工作中，学校的教学管理部门（通常是教务处）在推进“课程思政”建设中担负着重要的、甚至是引领性的作用。课程建设是高校教学改革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课程的教学实施则是教学的常规性工作。教务处无论在课程建设还是课程教学组织实施、质量评价体系建立中，应注重有意识地将“价值引领”功能的增强和发挥作为一个首要因素；在教学过程管理和质量评价中将“价值引领”作为一个重要的监测点指标。这样方可从源头、目标和过程上都做到强化所有课程都有“育德”功能的教育理念，并通过一系列教学建设、运行和管理环节将这种理念落到实处。具体而言，在培养方案、教学大纲等重要教学文件的审定中要考量“知识传授、能力提升和价值引领”同步提升的实现度；在精品课程、重点课程的遴选立项、评比和验收中应设置“价值引



领”或者“育德功能”指标；在课程评价标准（学生评教、督导评课、同行听课）的制定中应设置“育德效果”的观测点。

“课程思政”建设的重点在“思政”。没有好的“思政”教育功能，课程教学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从而导致课程教学中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与价值引领之间的割裂甚至冲突。然而，在现实的教学实践中往往存在一个认识上的误区，认为“价值引领”仅仅是“思政课”的任务和责任，其他专业课程则只管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这是“思政课”与专业课程之间产生“两张皮”现象、各门课程之间“同向同行、协同育人”合力难以形成的一个重要根源。“课程思政”教育教学改革正是针对这一高校课程体系和教学实践中长期存在的“痛点”，强调所有的教师都有育人职责，所有课程都有育人功能。不同课程在人才培养方案中都有其独特的作用，不同专业不同课程也有其自身建设的规律和要求，实施“课程思政”教育教学改革，正是在尊重课程自身建设规律的前提下，在实现课程的知识传授、能力培养等基本功能的基础上，挖掘并凸显其价值引领功能。这就要求，高校开设的所有课程都应以“课程思政”的新理念为指南，每日“三省吾课”：知识传授明晰否，能力提升落实否，育德功能实现否。在反思中改进，充分挖掘课程的育德功能，不断优化课程建设。惟其如此，才能真正让“各类课程与思政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的应然成为明天的实然。

“课程思政”建设的关键在教师。教师是教书育人实施的主体，也是课堂教学的第一责任人。“我的课堂我做主”是对主体和责任的宣告。马克思说：“思想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课程思政”建设要靠教师去落实，首先考验的是教师的育德意识和育德能力。建设一支具有自觉“育德意识”和较强“育德能力”的教师队伍，是确保所有课程“同向同行、协同育人”的人才资源保障。学校应加强教师的培训培养，利用新上岗教师培训、专业主任或专业责任教授培训、“课程思政”教育教学改革专题培训等多种措施，切实增强教师的“育德意识”，培养和提升教师的“育德能力”，并进而养成在课程教学中主动研究、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自觉意识。学校还应通过搭建“课程思政工作室”等平台，整合思政教师、专业课程教师、学生辅导员和班主任队伍，组建多学科背景互相支撑、良性互动的课程教学团队，通过



教师之间的“同向同行、协同育人”来保障课程之间的“同向同行、协同效应”。应善于借力，聘请符合条件的专家学者、地方党政领导、知名企业家、社会各条战线的先进人物担任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特聘教师。高校之间应加强合作，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相应政策，保障经费投入，形成特聘教师巡讲机制，为“课程思政”建设与实施提供优质教师资源。

“课程思政”建设的重心在院系。“课程思政”教育教学改革，既要求转变教育观念，也要求优化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方法，而且涉及全校各类各门课程，并不局限于某些个别专业点，因此，对高校教育教学改革布局、教学活动组织都带来了新的问题和挑战，需要建立起上下贯通、多元参与的运行机制。学校党委应切实担负起主体责任，真正成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责任主体，党委书记应起到课程体系“同向同行、协同育人”体制机制建设第一责任人的作用。校长、分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副书记、分管教学的副校长要切实负起政治责任和领导责任。但仅有学校领导层面的重视还远远不够。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规模的迅速扩大，许多高校实行了校院（系）两级管理，并把增加二级学院（系部）的办学主体作用作为一个改革方向，让二级学院（系）在人才培养方案制订、组织开展专业建设和课程改革、组织实施教育教学活动、开展教师培训、加强教学管理和考核、保障教学质量等方面能更加充分地发挥好作用。与此相适应地，“课程思政”的建设和实施，也应成为学校各二级学院（系）内涵建设的重要内容，明确其在“课程思政”建设中的具体责任，并上升到提升办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所必须的高度来认识和把握。这样，才能确保将各门课程“同向同行、协同育人”的理念和举措真正落到实处。

“课程思政”建设的成效在学生。学校一切教育教学活动的根本目的在于培养出更高质量的人才。因此，“课程思政”改革的效果如何，最终必须以学生的获得感为检验标准。一方面，高校要坚持“基于学生学习效果的教育”（OBE: Outcome based education）理念，在人才培养方案中明确德育和素质的要求，并以此为标准制定课程体系和课程教学标准。例如，鉴于我国已经正式加入《华盛顿协议》，该协议对学生毕业时必须达到的条件或具备的素质有很细化的规定。当前，许多高校的工科专业正在推行基于这个协议的专业认证，以此作为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的一个重要举措。这种从学生毕业标准出发来制订并实施教学方案和计划的思路，值得“课程思政”改革借鉴。另一方面，要加强对学生的研究。“千禧代”学生即将进入高校，他们成长在一个思想舆论相对多元化的时代，网络和社交媒体伴随着他们的成长过程，因此与以往的在校大学生相比有其自身的特点。来自发达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农村的学生在思想观念上也存在较大的差异。这种情况还体现在不同高校之间，适合一个学校的“课程思政”教学方案未必十分适合其他学校。为此，立足学校办学定位、基于人才培养特色、针对学生思想特点，有的放矢地设计教学内容、选择教学方法、制定评价标准，是保证“课程思政”实施效果的一个重要原则。

（来源：《中国高等教育》杂志 作者：李国娟）

立德树人：高校“课程思政”的探索与实践

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是高等教育的根本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高校立身之本在于立德树人。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这不仅在理论上回答了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更在实践层面上为高等教育的课程与教学改革提供了行动指南。

课程思政，是当前高等教育课程改革的热点词汇，是以立德树人为核心，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融入课程教学和改革各方面、各环节的一种实践探索。2017年，是“课程思政”由“上海经验”走向全国的普及推广之年，更是标志立德树人在高校从理念走向实践的关键之年。这一年，教育部在沪召开高校思政课教学质量年调研片会暨高校“课程思政”现场推进会，肯定上海“课程思政”的实践探索



和经验。此后，浙江、江苏等多地高校也提出以立德树人为中心，探索高校思政课程向“课程思政”的转型。“课程思政”贯彻落实立德树人，须厘清以下几个关系维度：

一、立德：“课程思政”的根本任务

立德强调的是道德养成，这不仅局限于要求受教育者学以近德、学以立德，还要求教育者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课程思政”源自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德育）课程改革的探索，其背景是部分高校重智育、轻德育；重知识，轻道德，学校课程以学知识、学技能为中心，高校思政课存在“孤岛”困境。聚焦这些问题，“课程思政”提出学校教育应具备 360 度德育“大熔炉”的功能，课程作为教育的主渠道应将知识传授和价值引领有机结合，在知识传播中强调价值引领。这与立德树人以立德为前提和根本的教育观相契合，鲜明指出泛工具化背景下课程的价值缺失，将“德”转化为课程中的伦理道德、理想信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内容，落实、落细、落微于教学过程中，以正确的价值观引领个人发展。这也是对知识走向道德，转识为智、化识为德，实现知识学习和个体生命成长相统一的疾呼，彰显了“课程思政”的人文价值。

二、树人：“课程思政”的核心要求

树人强调的是人才培养，涉及为谁培养人和培养什么样的人两大问题。纵观古今中外，高等教育一直是意识形态工作的主战场，其人才培养无不服务于国家和社会的发展需求。在新时代语境下，高校需要培养全面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反观大学教育，虽成就显著，却也遭遇发展困境。例如，高校能否实现科学研究和教书育人的内在统一？能否实现学科发展和学生发展的内在统一？能否实现知识传授和价值引领的内在统一？“课程思政”是基于这些问题自我反思后的再次出发，是一种政治立场鲜明的立体化育人探索。首先，它聚焦高校育人的价值本源，指出教育既要为社会培养具备专业技能的人，也要促进人的自我实现和全面发展，通过挖掘课程的价值意蕴，把育人目标落实到课堂教学中，实现本体价值和工具价值的统一。其次，它回归教育初心，以课堂为主渠道，将学科资源、学术资源、教师资源、社会资源等都转化为育人资源，实现育人和育才的统一，从而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三、课程：立德树人的路径选择

课程凸显的是立德树人的教育性。课程，是达成教育目标，开展教学活动的重要载体。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高校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坚持在改进中加强，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和针对性，满足学生成长发展需求和期待，其他各门课也要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因此，“课程思政”的探索，不能仅依托思想政治理论课，而应用好课程，用足课程，充分开发课程资源，利用课堂教学，构建全课程育人体系与育人环境。这既要求思政理论课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在课程改革中优化教学体系，创新话语体系，拓展实践教学体系，充分发挥显性课程的价值引领作用，还要求挖掘通识课程和专业课程的思想教育资源，在隐性课程中根植理想信念，实现知识与价值的同频共振。

四、思政：立德树人的中国视野

思政凸显的是立德树人的价值性。思想政治教育是一个颇具中国特色的德育词汇，虽然作为一个专门学科，它诞生于上世纪 80 年代，但我国却有着悠久的思想政治教育历史。从儒家思想中的仁义礼智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民族危机时的我以我血荐轩辕，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积极释义，都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涵，也是立德树人的价值维度。但是，教育仍需警惕历史虚无主义、普世价值等错误社会思潮的渗透，也需与享乐主义、功利主义等价值观的负面效应相抗衡，这对意识形态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面对挑战，“课程思政”要以立德树人为宗旨，深入挖掘课程知识和专业技能学习中蕴含的思政元素和思政资源，这是立足我国本土教育实践进行思想政治工作改革的中国视野和中国话语。

（来源：《宁波日报》 作者：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 聂迎娉）